填补近代史研究空白的开拓之作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评介

王俊义

由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最近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问世。阅读是书后，欣喜地感到这是一部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空白的开拓之作。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下简称《纪年》)全书七十万言，采用传统的编年体形式，对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840—1919)这八十年间发生的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清政府的救灾措施及弊端，依据翔实典型的历史资料，分别省区，逐年排列，经纬分明，眉目清晰的予以综合系统地记述，使读者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灾情状况，通过此书可有总体的全面的了解。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而《纪年》一书的编著者正是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灾害的研究，取得的可喜成果。我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加之人祸横虐，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真可谓“十年九荒”。而每一次大的灾害过后，又必然引起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激烈动荡。因此，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是探索历代人民生活、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深层因素。不仅如此，即使是生产力与技术水平大大发展提高了的今天，自然灾害仍严重威胁着中国和世界人类，为此，联合国通过决定，在1990年到2000年，开展“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由于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灾害损失严重，而防灾意识又比较薄弱的大国”，所以，我国有关方面决定：“应积极响应和参加这项活动”(见《人民日报》1988年2月13日)。可是研究自然灾害史，对今天掌握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增强防灾意识，提高防灾对策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却过于狭窄，许多应深入研究的领域都很薄弱，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至今，尚没有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反映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著述。李文海教授等正有鉴于此，从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强烈事业心、责任心出发，毅然选择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的课题，历经数载坚持不懈、终于推出较为全面系统反映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纪年》一书，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所以，我们肯定其是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空白的开拓之作，显非过誉之词。

《纪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专门史书，除具有上述明确的指导思想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搜集和运用史料较为全面、丰富、准确、翔实。这是同类史书都不可比拟的。该书作者清

醒地认为，他们从事的这项研究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如不弄清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对灾荒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就无从谈起。因而在编撰过程中，力求全面搜集各个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的资料。过去有关方面曾编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国地震目录》，顾名思义其仅只限于地震灾害这一方面的资料。有关方面还编有《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等，也只是限于某一、两条河流，或某一省区的自然灾害资料。而《纪年》则搜集了鸦片战争以来清代当时全国的二十三个省区，有关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历史资料。其包括范围之广，搜罗史料之全，都远远超过已有的同类史书。就搜集的历史文献资料而论，编者查阅了大量官方文书、文集、笔记、书信、日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尤其是充分利用了清宫档案，摘录了《录副档》中历年各省督抚等官员就各地灾情向清政府的报告。这些直接记载和反映当时自然灾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和翔实。更值得称道的是，编著者对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并非简单地照抄照录，而是经过认真地爬梳整理，甄选考订。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 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往往是真假掺杂，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的考订，才能成为可据的信史。如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1842年8月22日）黄河于江苏桃源县北决口，致使苏北黄水漫溢，田禾庐舍被淹甚多。当时的官方文书与时人的日记、文集对此次水灾多有记载。但张喜的《抚夷日记》记载“决口三百余丈”，而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却记载“决口一百九十余丈”。《纪年》的编者发现二者对“决口”程度的记载不同，又核查道光皇帝的上谕和其它有关资料，经过考订认为张喜之说“略有夸大”，曾国藩所说“与上谕所说相同，当较可信”。再如道光二十二年秋，江西部分洲县田禾被淹，并有淹死人口、冲塌房屋等事。但对于此次灾情，江西巡抚吴文鎔所上奏折，与道光皇帝就此次灾害的上谕，对受灾地区与灾害程度的记载却有很大不同。《纪年》在尚未查得其它有关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将两说并存。采取阙闻存疑的严肃态度，表明“此等岐异待考”，而不轻率的作出结论。如此等等，对于搜集到的数百万字资料，大都经过条分缕析，甄选考订，而后编定《纪年》一书。编著者的这种踏实学风，使得全书的史料，不仅全面丰富，而且翔实准确，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纪年》作为具有史料长编性质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只是客观的笔录史料，而是寓论于史，常常在记述史实的过程中，夹叙夹议，以简捷明快的语言，揭示出问题的实质。如记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春夏浙江发生的水灾，“连雨四十余天，上下数百里外，江河湖港与田地连为一片，不少城镇陆地荡舟，房屋皆坍，饥民遍野，浮尸累累”。在如此大灾之年，嗷嗷待哺的饥民，不得不开展“吃大户”、“借荒”斗争，“乡人结群毁富户门乞米”。清代统治者对饥民不仅不予赈济和同情，反而下令“有乘机抢劫者，格杀勿论”。有些史料还记载清政府将闹事的“首要”分子，“钉桩大堂下，缚跪烈日中，半日即毙，约重惩百十人”。《纪年》记述这些材料之后指出：“这个材料不但反映了自然灾害带给贫苦群众的痛苦，而且还生动地记录了封建政权怎样残酷地戕害那些无法生活而不得不向‘富户’强行‘乞米’的饥民的情景”。再如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黄河于江苏丰县“北岸大决，淹没生民千万”。灾区黎民“穷无所归，人皆相食”。而清政府下拨的治河费，“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骄奢淫

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故河患时警”。针对上述情况，《纪年》指出：“是年黄河决口，同历年‘河患’一样，正是腐烂的封建政治的逻辑表现”。诸如此类画龙点睛性的议论，散见于《纪年》全书，无疑增加了该书的思想深度，并使读者获得有益的启示。

《纪年》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筚路兰缕之作，自然也还有需要充实完善之处。譬如全书对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灾害的记述详略不匀，对内地各省记载较详，对于边疆地区的灾情则较疏略，反映出编著者对边疆地域自然灾害的资料搜集似显欠缺。此外，该书虽然也利用了一定数量的地方志中的资料，但更偏重于利用档案和《清实录》，对地方志中有关材料的搜集发掘也不够充分。这些方面还有待修订时进一步完善和充实。致于对各种灾害发生的原因和规律的探讨，对于救灾措施得失成败的评价，以及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也不是《纪年》这类偏重于资料搜集考订性的著作所能完全解决的。据悉，该书作者在目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正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灾荒史》，相信关于灾荒史的研究，一定会日臻完善和深入。

戴逸教授为《纪年》撰写的《序》中指出：“翻阅此书，近代史上自然灾害和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大致了然。我相信：中国近代史的同行们，各地正在编志修史的同志们，从事农业、水利、气象、地震、病虫害研究的专家们，以及致力于国土整治，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专家们，将此书置于案头，或则阅读，或则检索，都将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和信息”。这确是中肯之论。

（上接第46页）

——每篇文章末尾列出主要参考书目，既是撰稿人撰写本文的参考书和依据，也是向读者提供进一步了解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图书线索。为节省篇幅，不列详细注释。

〔**附记**〕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于1986年春天倡议编写的。我们断断续续地搞了三年。陈旭麓先生治史一生，著述宏富，识断精审，对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独具特色，驰誉海内外史坛。因积劳过度，不幸于1988年12月1日突发心肌梗塞，溘然长逝，绝笔人寰，使人痛惜不已。他没有来得及为本书撰写序言。谨以本书的出版永怀斯人。（**编者按**：《清代皇帝传略》将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